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欧美汉学研究的 历史与现状

〔中〕张西平 编

PARADIGMA
XV PROVINCiarum & CLV
URBium CAPITALIUM
SINENSIS IMPERII
CUM TEMPLIS
quae hucusq. existantur
I

四
· 商务印书馆 ·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欧美汉学研究的 历史与现状

〔中〕张西平 编

大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张西平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4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任继愈主编)

ISBN 7-5347-3850-4

I. 欧... II. 张... III. ①汉学—研究—欧洲—文集②汉学—研究—美洲—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271 号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编 者 张西平

责任编辑 佳 言

责任校对 裴新平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部 0371-63863556 总编室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77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序

余英时先生在为刘正的《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 20 世纪东西方各国的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一书所写的序中说：“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成果都称为‘汉学’，那么‘汉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学术和知识不分国界，这一原则今天也同样适用于一切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1930 年陈寅恪先生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曾提出‘预流’与‘未入流’之说。他认定‘敦煌学’是当时‘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人必须急起直追。今天的‘新潮流’则已扩大到中国研究的每一角落，不能再以‘敦煌学’为限。域外的‘汉学’已取代了当年的‘敦煌学’的位置。所以中国学者即使研究自己的‘国学’，也有‘预流’或‘未入流’的问题。”诚如余先生所言，汉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已经成为我们推动“国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世界各国汉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面对这一庞大的学术对象，应该如何把握？李学勤先生在《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一书的序中提出一个研究的思路，他说：“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

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尤其要注意,汉学家的思想观点是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存在密切联系的。因此,即便是研究一位汉学家,甚至他的一种论著,也需要广博的知识和深入的分析。”^①

将欧美汉学历史作为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国内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一些著作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对于开启欧美汉学(中国学)史的研究有奠基之功,但随着国内学术界对欧美汉学研究的展开,那种简略式的介绍已经不能满足国内学术界的需要。如果想继续推进汉学史的研究,我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

其一是做个案研究。对欧美各国的汉学家,重要的汉学著作,汉学流派逐一做深入的研究。只有经过这样不断的学术积累,我们才能写出一部国别汉学史。正像做中国史的研究,没有很好的断代史研究做基础,中国通史是无法写出来的。所以,目前在域外汉学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做个案和断代史的研究。学术是件急不得的事情,学术是要靠积累,有时要靠很长时间的积累,甚至几代人才能发展起来。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其二就是做好欧美各国汉学史著作或论文的翻译工作。汉学家们对自己国家汉学研究的历史已经有不少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在国内做汉学史研究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平心而论,他们的研究在史实上应更准确些,如果只是对国外已经出版的汉学史著作做一种中文的转述,不如直接将国外这些汉学史的研究著作翻译出版。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正在组织翻译一套国外汉学史的丛书,《德国汉学史》、《奥地利汉学史》、《俄罗斯汉学史》等书都在翻译之中。

现在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多是从近几年大陆、台、港、澳几地汉学研究刊物发表的论文和译作中挑选出来的,从中可以对欧美汉学自产生到发展的几个阶段的脉

① 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络,对欧美各国汉学研究的概况和发展现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事总体上对欧美汉学的产生和形成做了介绍。法国学者雅克·布洛斯的《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是从他的《西方发现中国》一书中择录出来的,文章简略精辟地叙述了中国和西方日益频繁的交往历史,从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东方观到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和马伯乐的汉学研究,在这种鸟瞰式的勾勒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汉学在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文化关系中的演进和发展。欧洲汉学曾经历了以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的三个阶段。游记汉学是西方汉学的起始阶段,少了这一环节,西方汉学就不完整。张西平的简述可以弥补这一缺憾。郑德弟、费正清的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耶稣会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在汉学研究中的地位,肯定了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德国两位 Franke 教授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位学者目前都是九十以上的高龄,而且他们两人也是欧美汉学界重量级的人物,由他们来讲述欧洲汉学的历史是再恰当不过了。^① 傅海波在他的《欧洲汉学史简评》中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信息,即美国中国学的最初阶段,其领军式的人物大都是欧洲的汉学家,这说明了欧美汉学界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傅吾康则对19世纪的欧洲汉学做了简要的回顾。他认为“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学者奠定了现代汉学的基础”,这使我们对欧洲19世纪汉学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部分可视为欧美国别汉学研究。读者可以通过这一组文章对欧美几个主要国家的汉学研究历史和现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葡萄牙人是最早来到东方的,对中国的发现一直是他们引以为

① 实际上傅海博(Herbert Franke)和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两人也是最早自觉地对欧洲汉学史进行研究的学者。Gauting Herbert Frank, *Sinologi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Wiesbaden, 1968; Gauting Herbert Franke, *Zue Geschichte der Westlichen Sinologic*, Colloquium Verlag, 1980; Wolfgang Franke, *Die Entwicklung der Chinakunde in der Letzten 50 Jahren*, NO-AG, 1952. 另, Herbert Franke 的中文名应是“傅海博”而不是“傅海波”。

豪的一件事。虽然,葡萄牙的当代汉学研究在欧洲已经不再引人注目,但在16至17世纪时,他们却是欧洲汉学的旗手。所以,开篇的两篇文章都是关于葡萄牙汉学的。意大利是汉学的故乡,在西方关于中国的介绍中,几乎没有人可以和马可·波罗的知名度相比,而在传教士汉学时期,意大利的传教士开创了欧洲第一个汉学研究的先河,罗明坚、利玛窦、艾儒略、卫匡国……我们可以开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字。但今天,我们对意大利当代汉学却所知甚少,白佐良和兰乔蒂两位教授的文章为我们描述了意大利汉学的全貌,读后颇受教益。在西方,人们常说,汉学是法国人创立的,读一下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的《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一文,即可知此话不假。了解了法国的汉学史,欧洲汉学史的主线条就已经抓住了。在西方最早到东方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个国家中,只有荷兰成为当代汉学研究的大国,不仅莱顿的汉学研究院名震西方,他们和法国联办的《通报》至今仍是西方最权威的汉学研究刊物。包罗史的文章还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南中国海和台湾的历史情况。俄国汉学虽然诞生得晚,但成就很大,有的学者把俄罗斯汉学和法国汉学、日本汉学并称为“汉学研究三巨头”。读了米亚斯尼科夫和李明滨的文章后,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东欧各国汉学成就最高的是捷克,这里我们发表的一篇文章是捷克汉学家写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捷克汉学发展的历史。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还收录了关于北欧的瑞典和挪威汉学史的论文,及英国、加拿大、匈牙利等国汉学研究的论文,可以粗略地勾勒出欧美国家现当代汉学研究的大致轮廓。

由以上介绍可知,本书仅是从地域和国别上对欧美汉学情况的概括和梳理,对在不同学术领域,西方汉学家所取得的成就还未展开论述。而且若从汉学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欧美汉学经历了“游记

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不同的时期,^①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按这个思路来编辑,实际上在一本论文集中想整个反映出欧美汉学的历史也是不可能的。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对其他方面的研究情况我们也会加以关注,将欧美汉学界在多方面的学术成果尽可能多地介绍给大家。

欧美汉学研究的成果已经对我国学术传统的重建与改造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或者说已经成为我们在进行学术“范式”转换时的重要参照系,对欧美汉学现状与历史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编辑这样的论文集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它的出版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能为国内的海外汉学史研究和国学研究尽绵薄之力。

张西平

2005年4月完稿于北京枣林路游心书屋

^① 这个分期既是时段性的,即这个分期大体符合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同时这个分期也是从学术“范式”的转换上来讲的,即西方汉学在研究的模式上大体经历了这三种类型。但这样的划分只是一个大略的分期,在实际的西方汉学历史发展中,它们也是有所交错的,例如,在专业汉学诞生以后传教士汉学也依然存在。

目 录

序 张西平

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

..... [法] 雅克·布洛斯/著 李东日/译(001)

西方游记汉学简述 张西平/著(044)

传教士汉学的开拓者——入华耶稣会士 郑德弟/著(070)

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 [美] 费正清/著 吴荪荃/译(088)

欧洲汉学史简评 [德] 傅海波/著 胡志宏/译(106)

19 世纪的欧洲汉学 [德] 傅吾康/著 陈燕 袁媛/译(119)

葡萄牙汉学回顾 [葡] 阿雷斯塔/著 张公/译(130)

16 世纪葡萄牙人的中国观 吴志良/著(143)

1600—1950 年的意大利汉学 [意] 白佐良/著 潘琳/译(162)

意大利汉学:从 1945 年至今 [意] 兰乔蒂/著 潘琳/译(174)

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 [法] 戴密微/著 胡书经/译(183)

拓荒者和引水者:莱顿大学的早期汉学家(1853—1911)

..... [荷] 包罗史/著 王筱云/译(223)

德国的中国研究历史、问题与展望

..... [德]马汉茂/著 廖天琪/译(264)

德国的中国研究及其中文教学 李国祁/著(281)

俄国汉学史(至1917年前)

..... [俄]B. C. 米亚斯尼科夫 A. C. 伊帕托娃/著 柳若梅/译(309)

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汉学史 李明滨/著(323)

英国的中国学 [日]近藤一成/著 王瑞来/译(346)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 王晴佳/著(368)

面向新世纪的瑞典中国研究

..... [瑞典]罗多弼/著 高建平 李明/译(381)

挪威的汉学研究 张台萍/著(409)

19世纪末至今捷克汉学史

..... [捷克]奥古斯丁·巴拉特/著 王骏/译(419)

匈牙利汉语研究史

..... [匈]巴那巴斯·松戈尔/著 钟吉娅/译(436)

加拿大汉学概况 [加]白润德/著(443)

从西方发现中国到 国际汉学的缘起*

[法] 雅克·布洛克斯/著 李东日/译

如果浏览一幅世界地图,那就会看到一直伸入到大西洋中的欧洲就如同一个统一的大陆——欧亚大陆的整齐的尖顶。在要庞大得多的另一端,黄色的亚洲的正面——辽阔的中国一侧向太平洋开放。它的前面有一系列岛屿,即与不列颠群岛相对的日本岛。在泰西与远东这两大文明的发源地之间,蜿蜒着辽阔无垠的荒凉地、群山区,难以穿行;而在沙漠大碛和茫茫草原中生活着大量居民,这些人的增长和非常有限的生活资源迫使他们经常迁徙以觅求新的地盘。游牧人时续时断地从这一巨大的蓄水池中向东西方被定居居民占据的肥沃地区倾泻。中亚的胡族是屡次大规模入侵的肇事者,而发祥于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也前来置身于东西方之间,他们形成了比自然险阻本身还要难穿越得多的一道屏障。

直到近代之前,欧亚大陆的历史从此就一直受这些游牧部族的左右。人们有时能从大陆的一端行进到另一端,有时交通又受阻。但除了在最为混乱不堪的时代之外,欧洲从未完全忘记在大地的另一侧还存在有一片居住着黄种人的土地。当时的罗马人称之为“赛里斯人”(Séres),即“丝绸国之人”,他们使用了一个在汉文中指

* 译自巴黎1981年出版的《发现中国》一书。——编者注

“丝”的词。

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历史学和地理学之父希罗多德就描述过沟通希腊与遥远东方的商队大道,但只讲到中亚群山区为止,其右就是未知之地了。但希罗多德也没有忘记转载普罗科尼撒的某一位亚里斯多的记叙,此人曾深入到比较遥远的地区,甚至还曾讲述过某个一直伸到大海的民族,即极北人。我们可能应把该民族看做是中国人。

在公元1世纪时,中国的丝绸传到了罗马,在贵妇人中风靡一时,却使古罗马的社会风纪监察官们义愤填膺。如普林尼就曾写道:“现在开始从一端到另一端地穿行整个大地了,而这完全是为了使罗马贵妇人能在一种透明的薄纱下卖弄其媚态风骚。”当时在罗马尚不能确切地知道这种丝绸的特征。它受到了如此赏识,以至于很快就禁止男性使用了。维吉尔和甚至是4世纪的玛尔塞林都把它当做是来自某些树叶上的一种“柔软绒毛”。这很可能是他们听说过的桑树,桑叶成了蚕虫的惟一食物,而大家都知道蚕虫是一种蚕蛾的幼虫。但在公元2世纪时,包撒尼亚斯断言丝绸是由一种大爬虫织成,犹如蜘蛛结网一般。在罗马军团占据小亚细亚部分地区的时候,汉代的中华帝国一直向西开拓并遣使赴安息人的伊朗帝国。

当时存在着两条通商大道。其一为陆路,由骆驼队跋涉,这就是丝绸之路。它从安都起,穿过了整个安息帝国,然后在到达中国之前要越过帕米尔和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最后到达了可能为长安城的赛拉首都(丝都)。但这条路受安息人控制,仍在充当中间经纪人的同时又极力阻碍在中国和罗马社会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甚至阻止了公元97年中国派向大秦(赛里斯人知道的罗马帝国)的第一个使节。正如《后汉书》中所证实的那样,中国人对这一切抱怨不已,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缯丝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另一条路就是海路,它就是未来的“香料之路”,经红海和印度洋而抵达马拉巴尔印度海岸之谬济里斯或科罗曼德尔河岸的本地治里,然后再经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支那而沿中国海岸北上,一直到达

《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的“特大城”秦那(Thina),该书是一位定居在埃及贝雷尼斯的希腊商人为供他派向远方的经纪人使用写成的。这种海路贸易往往要使用由100多艘船舶组成的船队,利用季风航行,八个月往返一次。但无论是经陆路还是海路,罗马和中国运输者们从不会走完这条路的全程,而基本是在全程中途接换。所以《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指出,只有很少的海员敢于冒险直达中国海。汉文史著中却提到公元166年有一名罗马商人到达中国,此人声称受安敦皇帝派遣。但这些航行打破了双方彼此的互不了解,逐渐增加了地理学知识。

虽然远不如丝绸著名,但欧洲人又引入了两种原产于中国的果树,即桃树和杏树。前者的名称“波斯梅”就说明罗马人如同在他们之前于亚历山大远征时就发现过它的希腊人一样,说认为它原产于波斯。事实上,这种树是经过商队之路从中国传到波斯的,自第三个千年纪以来就有人在那里培植和改良它。杏树(罗马人叫做“亚美尼亚梅”)也通过同一条路于公元初传到罗马,亚美尼亚也仅仅是经中国人长期培植的这种树的一个传播站。

但是,与中国通商使罗马人最终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他们为了交换丝绸、皮货和香料,只能提供羊毛织物和绢布,以补偿他们的采购物。所以他们还必须从中再加入大量黄金和白银。普林尼就已指出的这种逆差很快就形成了一种过分沉重的负担,这种贸易从公元2世纪末就开始衰败了。继萨珊王朝的伊朗进行扩张和匈奴——唎哒人占据突厥斯坦之后,中国和罗马帝国的全部贸易关系于3世纪末中断了,这两个国家同时进入衰败期。在中国,汉帝国气数已尽,草原上的游牧民匈奴人入侵了其领土。

当这些交往于数世纪之后重新恢复时,它们只能通过几个中转站来进行。首先,以君士坦丁堡为都的东罗马帝国已于330年创建。428—431年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成了后来变为一种异端的教派之创始人,该派也不承认耶稣为上帝的儿子,而是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两种造物——人和神不再像正教所断言的那样统一,而是分

离了,新教理在431年的以弗所公会议上遭批判后传入了波斯,聂斯脱利派(景教)主教于498年在波斯的塞琉西亚主教会议上组成了一个东方独立教会,由一名天主教的主教管理,其传教士们一直向东扩展。公元549年,在乌浒水流域的匈奴吠哒人(白匈奴人)中有一名主教。635年,某一位阿罗本到达中国并在那里创建一个景教修会,受到了唐朝最初几位皇帝的友好相待,恢复了中国之大统的唐朝的势力和文明达到了鼎盛。基督教在中国立足的首次尝试在开始时相当兴旺,但仅持续了不足两个世纪的时间。845年,一位仇视外来宗教的中国皇帝使所有的教会财产都被世俗化并禁止任何布教虔诚。由此而遭受最大打击的是佛教,它从此再未复兴,但也殃及到了景教派。在10世纪时,他们从中国消失了。他们在三个世纪之后才随着蒙古人的足迹而又返回那里,因为景教修会在中亚残存下来了。

景教修士们在东西方之间大量旅行。555年,有两名景教徒生活在中国并在那里掌握了一直保持到那时的养蚕术之秘密,在一根竹杖中把蚕蛾卵带到了君士坦丁堡,这样做是冒着被处罚重罪而定的死刑的危险。不久之后,蚕虫必不可缺的食物白桑叶树也自中国经波斯传到了拜占庭帝国。所以,在查士丁尼执政期间,创建了西方的第一家丝绸企业,后来变成了国家的垄断工业,充实了国库,形成了拜占庭与西欧贸易的重要内容,为该帝国的富裕和豪华的声望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另外的明显后果就是与遥远的中国通商的迫切性大大缓和了。

欧洲仍然不能缺少某些远东产品。主要是香料、桂皮(在波斯叫做“中国树皮”),特别是作烹调和药用的胡椒。从7世纪开始,阿拉伯商人就负责运输,他们直到16世纪仍然垄断这种商品交易。从先知归真(632年)到普瓦蒂埃战役(732年)的整整一个世纪中,阿拉伯人(大食人)割据了从西班牙和摩洛哥直到中华帝国的边陲突厥斯坦的一个辽阔的帝国。阿拉伯人的队伍中有各种来源的受归化者。他们不仅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所有通商大道,而且也由于他们那坚实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几乎到处都建造的仓库,尤其是由于他们

的创业思想及其旅行家们的勇敢精神,这些阿拉伯人大幅度地发展了国际交易。这样一来,他们就大大增加了知识,正如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证实的那样。该书最早被归于商人苏莱曼,但近代学者则证明这是一部佚名著作,其中囊括了由阿拉伯商人在远东搜集到的并可供后人使用的全部资料。

就在该《见闻录》的时代,阿拉伯贸易又由于阿拔斯哈里发们的新都巴格达豪华(其富裕和穷奢极欲现象已反映在《一千零一夜》中)刺激的需要而最后成为一种奇迹般的活动。不仅阿拉伯船舶一直驶航中国,而且中国帆船也一直挺进到波斯湾。在中国的南方大港广州(当时那里共计有二十五万居民)就住有一千多名番邦人。大批地拥向那里的阿拉伯人在该城拥有清真寺并由他们自己的教长主持。所以《中国印度见闻录》就可以提供当时传到西方的对中国人及其风俗习惯的一种粗浅描述(无疑是不完整的,但却是忠实的)。例如,我们从中就已发现记载有茶叶是“一种具有沁人心脾的香气和略带涩味的草,他们用热水泡饮”。该书中也提到了中国瓷器:“一种优质瓷,可以制造如同玻璃瓶一样细腻的杯碗,我们可以透过瓷面看到其中的水。”这种对中国(其耀眼的光彩在唐代已达到鼎盛时期)的描述在数世纪期间始终被继承了希腊人之衣钵的阿拉伯舆地学家们奉为楷模,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还从他们的著作中汲取其有关遥远的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大部分知识。

穆斯林商人们在垄断香料贸易时可以确保一种赚取巨额利润的财源。胡椒是所有香料中最负盛名和最昂贵者,要用黄金的价格来采购之。如果说阿拉伯人前往马拉巴尔的印度海岸寻求胡椒,那么他们就要一直到达中国以在那里获得桂皮和其他拥入广州的东南亚香料,其中生姜在中世纪几乎与胡椒一样贵重。他们还从中国运回由药剂师和香料师们使用的各种药品,如麝香、香檀木、鹰木,此外还有中国的发明创造物,即当时已在穆斯林世界传播开的瓷器和纸张。阿拉伯人在10世纪时仍从中国引入柑橘树,他们先将此树引入西西里,然后又引入西班牙进行栽培。我们还要具体说明一下,这里是指

酸橘树或酸橙树,主要作药用;甜橘树在 16 世纪才由葡萄牙人从中国传入欧洲。

阿拉伯船只从远东运来的舶来物首先卸于波斯湾码头,然后再用骆驼商队从那里一直运往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但在 11 世纪时,埃及的法蒂玛王朝人却截夺这种有利可图的商品,从此这些商品的海运就要经由红海和亚历山大港。比萨人,稍后是热那亚人,最后是威尼斯人再从那里用双桅帆船把这些珍贵商品一直运到意大利或法国港口,再从那里经阿尔卑斯山口或沿罗纳河而抵达维也纳和巴黎,最后到达弗拉芒地区和英吉利。如果说阿拉伯人不会放过从香料中攫取巨额利润,那么可以说威尼斯人也是如此行事的,威尼斯正是由于这种贸易才变成了西方诸城中的最为豪华者。

在 11 世纪的东方,政权转移到了塞尔柱突厥人手中,他们于 1078 年夺取了耶路撒冷。虽然他们也如同其前人一样对法兰克人的朝觐者表现得很宽容,但当时在拜占庭人的压力下,西欧仍作出了反应。西欧的觉醒是通过收复被不信基督者们占领的地盘表现出来的,如被游牧人侵占的西西里和当时已成为一场准十字军远征的在西班牙进行的一切圣战。众所周知,这场战争是根据皇乌尔班二世在 1095 年的克莱芒主教会议上的演讲而进行的。

在 12 世纪的前四分之一年代中,十字军已在叙利亚牢固地立足。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法兰克领地,当时已分裂的穆斯林势力未能对他们作出有效的抵抗。但从该世纪末起,随着强大的萨拉丁夺取政权,圣地被包围。从十字军于 1204 年夺占君士坦丁堡后,继而出现了拜占庭帝国的分裂,宗教的高潮已低落,法兰克人王公之间的竞争与日俱增,基督教诸邦一批接一批相继崩溃。

1221 年,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震撼了基督教诸邦。它是由一名可信的观察家雅克·德·维特利传递的口信,此人为托勒密地区的主教。当时正作为十字军的布道者而身处东方。维特利在他分别致教皇、奥地利莱奥波尔德大公、英吉利国王和巴黎大学的信中宣布,在东方刚刚出现一名出乎意料的基督教的捍卫者,即来自印度的某

一位大卫国王,他率一支人马不计其数的大军从背后进攻穆罕默德派信徒。该国王“摧毁了撒拉逊人帝国并保护基督教会”,他作为上帝的使者而及时赶到了。事实上,应教皇霍诺流三世呼吁而组织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局势已严重恶化。其主要首领从遭受第一次失败起就乘船返航了,十字军离开了叙利亚前往埃及,打算在那里获得更丰盛的战利品。十字军在围困二年半(其间制造了无数牺牲)之后,攻克并劫掠了达米埃塔城,但撒拉丁的侄子——埃及和大马士革的苏丹们联合起来包围了法兰克的军队。这次是轮到遭困的法兰克人坐等援兵了。

上帝的干预并未发生,十字军必须交出达米埃塔城,他们对由于撒拉逊人的宽容而能够撤退感到十分高兴。从东方来的军队已接近了,但他们不是前来救援十字军的。大卫王国事实上叫做成吉思汗。他在成功地统一了蒙古民族之后又说服了其首领们,如果他们停止彼此之间的战斗,那么他就将率领他们去征服世界。蒙古军队在东方于1218年夺取了北京,在西方则入侵了中亚的花剌子模、撒马儿罕地区,并向波斯的穆斯林和突厥伊斯兰教徒发起了进攻,这样就产生了维特利的解释。时隔不久,蒙古人的名声就只会引起恐惧了。在1230年左右,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统率的一支蒙古军队入侵了鞑罗斯,鞑罗斯从此之后在两个多世纪中就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蒙古军队又蹂躏了波兰、西里西亚和匈牙利,其先头部队一直挺进到维也纳的郊区。蒙古人所到之处无不在其后面留下烟火中的废墟和堆积如山的尸体。整个欧洲生活在惶惶不安的噩梦之中。窝阔台合罕于1241年的晏驾标志着蒙古人向欧洲挺进的结束。

但是当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8年夺占巴格达并以马蹄践踏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最后一位哈里发的领土时,蒙古人在波斯已歼灭了穆斯林势力。到了13世纪末,惟一残存的伊斯兰势力是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国。它们之间互相策应,但被夹在蒙古人的前头阵地与基督教西方之间。此外,蒙古人当时确实已与基督教君主结盟以对付伊斯兰教,他们对基督教没有任何敌意,因为他当时通过